

龚全珍：从将军夫人到山乡教师

□ 胡晓军 李可

龚全珍，有着“将军夫人”的头衔，却数十年如一日扎根山乡，和村民悲欢与共、对基层群众竭尽所能。

鲜花盛开的5月，记者来到罗霄山下的革命老区、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县——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追寻这位有着60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平凡而伟大的传奇人生。

信念笃定,老而弥纯

面前的龚全珍，身形瘦小，衣着素朴，满头银发，阅尽世间百态的眼眸澄净安详。她脸上的皱纹镌刻着近一个世纪岁月的沧桑，只是，那明晰的思维、清晰的谈吐，浑然不似90岁高龄。

1957年，毕业于西北大学教育系、时为新疆军区子弟学校教师的龚全珍，随同丈夫、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开国少将甘祖昌离开乌鲁木齐，来到将军故乡莲花县坊楼镇沿背村定居——因战争重伤后遗症，甘祖昌难以坚持领导工作，经多次主动申请，最终偕家人回乡务农。这一年，她34岁。

此后50余载，龚全珍远离尘嚣，倾力执教农村中小学的同时，也曾赤脚下田，荷锄上山。即便年老离休，仍奔忙于发挥余热，捐资助学，扶贫济困，向青少年开展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您一定吃过很多苦。”记者说。
“谈不上吃苦，和父老乡亲比，算不了什么。不过，刚来的头两年确实有点儿不太习惯，吃不了辣，听不懂话。”从北方大城市忽然来到南国穷乡僻壤，要面对各种艰难困苦，对此，老人淡然一笑。

是什么，让她对山乡生活始终安之若素？是什么，让她在教育一线始终执著坚守？

龚全珍说，丈夫对她的影响至深。自回到家乡到1986年丈夫去世的29年里，甘祖昌将军与群众同甘共苦，拿出自己80%的工资为家乡开垦荒山、改良土壤、修水利、建电站、建校舍。“活着就要为党和人民做事情，做不了大事就做小事，干不了复杂重要的工作就做简单的工作，决不能无功受禄，决不能不劳而获。”多年来，她始终铭记着丈夫的话。

然而，似乎不尽于此。
从到达莲花定居至今，龚全珍在工作之外一直保持着两个业余爱好，一是阅读；二是写日记。她的工资，一部分固定用来购买书籍；她的日记本，已经写满了几十册。在阅读中，她与曹雪芹、路遥、托尔斯泰对话；



龚全珍展示家中的老照片。胡晨欢 摄

在日记里，她记下了工作心得，也记下了自己关于社会、关于人生的思考和感悟。除了家人亲朋，她的精神世界里，始终有一份完全属于自己的天地，有一份完全属于自己的追求。

以身立教,为人师表

龚全珍目前和她已退休的三女儿甘公荣一家一起，住在莲花县城。

谈及母亲，甘公荣说：“妈妈并不认为自己有多无私多伟大，她觉得作为共产党员，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她也不会经常挂在嘴边，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别人告诉我我才知道。”她的乡音较重，与龚全珍的北方口音普通话形成鲜明的对比。

“有人也问过我，说‘你妈妈普通话那么标准，怎么你却说不好？’我小时候在家，妈妈在外面教书，通常就只是星期天回来一下，那时我很少有机会跟她学普通话。”仿佛看出了记者的疑惑，曾获“全国金融系统劳动模范”称号的甘公荣说，“小时候我总觉得‘爸爸是农业社的爸爸，妈妈是那些学生的妈妈’，直到长大以后才慢慢理解了。”

56年前，龚全珍来到莲花县沿背村，把家安顿好后，第一件事就是到县文教局联系工作。就这样，到了当时新办的九都中学任教。这所学校条件极差，只有3个老师，校长都没有。没有一丝迟疑，第二天她就搬铺盖去上班了。后来，文教局想调她到南陂小学去当校长，但又怕她从中学到小学去不愿意。没想到征求意见时，龚全珍笑了：“我只要有书教，能和孩子们在一起，中学小学都一样。”她高兴地去了南陂小学。再后来，她又调到甘家小学。

“那时候，龚老师看起来跟我们

一样，就是个乡下人，一点架子都没有。”龚全珍当年的同事、如今已75岁的刘永林回忆说，“她当班主任，和女生住一起，师生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读初一那年，刚恢复开设英语课，龚老师教我们。我们这些乡下小孩子哪里听过英语啊，听她读ABC我们都哈哈大笑，可龚老师没有生气，鼓励我们珍惜时间好好学习。”龚全珍当年的学生、如今也是头发斑白的刘根兰回忆说，“龚老师对我们这些农村孩子真是关怀备至，经常掏钱给我们买文具。”

对龚全珍而言，教诲、关爱学生，既是自己人生价值的体现，更是为人师表的责任。

离休后，她把这份责任继续扛在了肩上。

为了不给予女增添麻烦，1992年，龚全珍住进了莲花县幸福院。闲不住的她将常来院里玩耍的10余个学生组织了一个课外学习小组。买来书籍、资料，辅导孩子们学习。这个幸福学习小组一直坚持到1997年她搬离幸福院。这期间，她还担任了县城琴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她在的话，我要向她鞠躬三躬！”在琴亭小学副校长贺敬华眼里，龚全珍是她最敬佩的人，“学生们都亲切地称她龚奶奶，总盼着奶奶常来学校。”

2004年，龚全珍老人在与孩子们的交流中，发现孩子们喜欢生动直观寓教于乐的教育方式，于是，她想方设法搜集到与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相关的近百幅漫画作品，编制成包括“鲜艳的红领巾”“引导·教育·思考”“遗憾的家教”“社会的责任”等9个板块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漫画展，亲自送进了各所学校。

尽管现在离开了教师岗位，但她

还是最喜欢人们称她龚校长。“不是因为带了‘长’，而是因为这个称呼和学校联系在一起。”龚全珍说。

坚守永恒的爱与品格

她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又是江西萍乡莲花县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她已是90岁高龄，有着60多年党龄；她放弃大城市优越的生活，选择回乡与乡亲建设共同的美好家园；她坚守着革命前辈的优良传统，更孜孜不倦地将其传播到青少年中间。龚全珍，以崇高的人格立世，给身边人带去温暖的力量。

永葆本色，是甘祖昌将军生前嘱托，龚全珍坚守的是一份爱的信任；永葆本色，源自革命老区的血脉情谊，龚全珍坚守的是一份返璞归真的赤子情怀；永葆本色，源自她饱经风霜的人生阅历，龚全珍坚守的是岿然不动的品格准则；永葆本色，源自她自觉的党性高度，龚全珍坚守的是共产党人一心为民的崇高使命与坚定信念。

使命不是空谈，信念不是高蹈。龚全珍不但多次捐款救灾、资助贫寒学生、帮扶困难家庭，用点点滴滴的爱滋润乡里，而且有着更大的担当，组建志愿者服务队、创新社区管理机制、致力革命老区教育事业，将个人的精神力量不断壮大成一种风气。龚全珍以实际行动作出榜样：使命应该落到实处、细处，信仰更可以是以温润的、具体的、可感的。先进，而又始终保持着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始有着不懈的活力，龚全珍有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高尚情怀，一生践行着共产党人的使命与信念。

信仰与精神的力量曾经鼓舞着革命前辈夺取胜利，龚全珍是这份光荣革命传统的当代护旗人，满腔忠诚，臻于雋永。龚全珍以其感人事迹，向人们展示了党性的温度，也展示了革命传统的当代特色与信仰力量的新高度。这份信仰仍然鲜活生动，慰藉社会，激励社会，仍然是社会道义的准心，仍然是一股可贵的精气神，给予人们感动、勇气和信心。

向龚全珍致敬！
(摘自2013年5月28日《光明日报》)



和毛泽东畅谈8小时

□ 陈晓琪

抗战后期，中外记者参观团到延安采访、考察，受到热情接待。毛泽东的幽默随和、远见卓识以及巨大的人格魅力，征服了这些政治倾向迥然不同的外国人……在这些记者中，最先和毛泽东有深入沟通的，就是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

1944年，斯坦因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中，详细记录了他对毛泽东的单独采访。这次谈话发生在下午3点，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凌晨3点。他们聊到了共产主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工业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等。斯坦因描述道，毛泽东不时地在窑洞里来回踱步，然后在他面前站定并注视着他。毛泽东一直谈到吃晚饭时才停下来。他们走出窑洞在一棵老苹果树下共进晚餐。毛泽东仍然不停地抽烟，斯坦因则继续在纸上记录有关中国共产党以及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的一些目标。

晚餐后他们回到窑洞，一边喝酒一边继续交谈。斯坦因几次站起来想离开，毛泽东仍然挽留他，希望多谈谈。毛泽东同这位敏锐但毫无名气的新闻记者一谈就是12个小时。斯坦因回忆说：“直到凌晨3点，当我最终站起来离开的时候，我感到意识不清、四肢发麻、眼睛发胀。而毛泽东还像下午时那样精力充沛，讲话有条不紊。”

斯坦因对毛泽东的几次单独采访，总共长达30个小时。1944年10月，他离开延安后，发表《8600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等文章，并于1946年在英美出版《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些客观、真实、详细的报道，增进了外界

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了解和同情，使外界看到了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未来前景。

在斯坦因的笔下，“我完全自由地去做调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和谁谈话，就和谁谈话。没有不准问的问题，也没有被拒绝的答复。延安的政治场面朴素、安静、简单，就像它所处的位置一样。共产党中央是一个安静而繁忙的地方，在这里，几百个工作人员把工作和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这是一种踏实的、自发的热情。有一种开路先锋的豪情。”

(摘自2016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

红色大刀见精神

□ 夏邦鑫



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纪念馆内陈列的大刀

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纪念馆，陈列着一把红5军团曾使用过的大刀。这把锈迹斑斑的大刀长60厘米、重2公斤，刀柄末端有个圆环，又叫环首大刀。

在战场搏杀中，由于大刀的刀刃部分仅40厘米长，杀伤力较弱，因此在敌人的刺刀面前处于劣势。此

外，携带大刀还会增加战士的武器负重，加剧体能消耗。

当时，红军战士选择装备大刀，更多是无奈之举。刺刀制造工艺精密，红军当时无法生产，而大刀只需铁匠打制即可。即便是如此简陋的大刀，还是参加过宁都起义的部队带来的“优势装备”，当时很多红军战士所用大刀不过是一层薄薄的铁皮。

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红军战士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他们将传统的刀术与战场搏击技术相融合，不断改进，创造出更加精炼有效的杀敌术。赣州战役中，红5军团的战士挥舞大刀冲进敌阵，把受困的部队解救出来；水口恶战中，红5军团的战士用大刀撕开了敌防线的一道口子，一举击溃敌人。

(摘自2023年4月2日《解放军报》)

初到达德学院

1946年6月，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转至香港。

1947年初，邓初民从重庆回到上海。国民党对他的迫害进一步加剧，为了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及时将其秘密转移至香港。负责邓初民行程的是《文萃》的总编辑黎澍同志。邓初民乔装成商人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此行家人、朋友则全然不知。4月22日傍晚时分，他在瓢泼大雨中平安抵港，风雨交加、衣衫尽湿。

到港后，邓初民暂住在九龙汉口道26号。次日，中共负责香港统战工作的连贯、林平便前来探望。据邓初民回忆，这也是他与连贯、林平的第一次见面。邓初民的朋友章汉夫、陈树渠、冯伯恒、萨空了、千家驹、刘思慕等都纷纷来到他的寓所小聚，邓初民也第一时间拜访了在港的何香凝、彭泽民等先生。很快，达德学院院长陈其瑗便来家与之确定赴校时间，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达德学院于1946年10月创办，在中共的安排下，民主人士陈其瑗出面担任院长，学校坐落在新墟青山脚下，蔡廷锴将军的别墅“芳园”里。这所学校汇聚了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一批著名学者，师资阵容可谓在中国教

邓初民在达德学院的岁月

□ 张原（邓初民曾外孙）

育史上罕见，翦伯赞、侯外庐、邓初民、朱智贤、茅盾、沈志远等人均在此任教。

初到达德学院，学校为邓初民举办了隆重的欢迎会。达德学院设置有法政、经济、文哲三个系，1947年增设了新闻修专班。1946年向当时的香港政府申办学校时，就将还在内地的邓初民聘为法政系主任，邓初民来港后便随即赴任。在此之前，已有许多邓初民的旧识和学界的友人在此任职和任教。之后，翦伯赞、侯外庐、宋云彬等人也纷纷加入达德学院的学术阵营。

达德学院有着非常民主的校风，邓初民来到后不仅参加学校的校务、教学会议以及教授会议，还和主任们一起召开朝会，在晚间召开学生座谈会，参加学生的自治会，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学生的学习状态等进行分析和研判，并对授课内容等重要议题进行商议，也根据当时的革命环境和斗争需要增加对时事的讲授，帮助学生解决学费困难等问题。在港期

间，邓初民也时常就达德的校务之事参加中共香港相关负责人如连贯等人安排的会谈，其中还有陈其瑗、李伯球等负责校务的民主人士和教授。

最受学生爱戴和敬重的教授之一

邓初民是最受学生爱戴和敬重的教授之一。学生们不仅邀请邓初民参加他们的生活会议，还请邓初民为学生组织的活动作专题讲演和报告。邓初民当时主要讲授“政治学理论”和“行政原理”等课程，覆盖了达德学院几个院系的各个年级。在此期间，邓初民还在南方学院等其他几所院校任教。为此，邓初民腾出大量的时间用来备课，反复修改讲义，生动阐释中国革命道路的走向和时局的发展。在课堂上，邓初民注重加入时事政治的学习，让同学们讨论对第三条道路、中共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等重要问题的认识。

邓初民的讲课颇受同学们喜爱，这与他始终将革命实践与理论、教学相结合不无关系。在香港，民主党派与中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华商报社组织的高层统战座谈会定期召开，团结和凝聚左翼民主人士的共识。此外，他们还借助香港的地区优势联系新加坡、泰国、印尼等地的进步革命力量，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

与此同时，在港的进步人士始终关注内地的斗争形势，配合革命斗争的需要展开活动。比如邓初民参与了营救杨伯恺的活动；组织召开了纪念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邹韬奋逝世周年的纪念座谈会；与中间路线展开争论；参加《光明报》《文萃》《唯民周刊》等在香港复刊的事宜；参加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和民革的创立等重要政治活动。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邓初民在与港的民主人士、民主党派领导人积极响应中共召开新的政协会议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他运用著书论说、发表演讲

等多种形式参与讨论、阐释新政协性质、地位、施政纲领、领导权等重大问题，在华商报社组织的高层座谈会上他发言说：“中共的五一口号对团结各民主党派，动员广大人民民主力量，促进革命具有重大意义。”邓初民开阔的理论视野和呼应时代的革命实践深深打动和启蒙着达德同学们的思想。

难忘师生情谊

在达德学院的岁月中，最为难忘的还有邓初民与学生的一段师生情谊。杨济安、张克明、周培克、沈瑀英等都是常聚在邓初民身边的同学。邓初民不仅记得授课班级每一位同学考卷的答题情况，还引导和启蒙着他们的革命思想，影响他们走上革命的人生道路。

在达德学院牺牲的学生烈士中有一位女生叫关汉芝，邓初民曾讲述她在达德学院的情形，关汉芝活泼、开

朗的样子和积极的心态给邓初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关汉芝告诉邓初民她虽被中学开除，但父母爱女深切，不顾社会上的不利言论，支持她来达德读书，当时她刚住进学校，满怀希望开始了新的生活。此后，关汉芝时常写信给邓初民，汇报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邓初民在百忙之中不忘给予她鼓励和鞭策，更激发了她的革命热情、坚定了她的革命意志。然而，这样一个年轻而美好的生命却在1949年华南游击战中不幸牺牲，令人扼腕。

1948年10月，在中共的安排下，达德学院的师生为邓初民组织了六十寿辰的庆祝活动，这场气氛热烈的祝寿贺宴也成为凝聚民主力量、扩大民主力量在港影响力的一次社会活动。多年之后，每遇困难，邓初民依然为达德的学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每每提起这段难忘的岁月，邓初民总会谈起他与这群学生的过往。

1948年底，邓初民与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结束了他们的教学任务，也完成了他们在香港的历史使命，挥别达德。1949年元旦，他们在轮船上迎来了新年的曙光。彼时，他们正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准备迎接新中国的光明，去拥抱一个全新的开始！

(摘自2023年8月24日《人民政协报》)